

13-14 世纪东迁色目家族的理学与文学

NEO-CONFUCIANISM AND LITERATURE OF THE SEMU FAMILY WHO MIGRATED EASTWARD IN THE 13TH AND 14TH CENTURIES



<https://doi.org/10.24412/2181-1784-2023-21-400-411>

胡蓉

(甘肃政法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中国兰州, 730070)

Hu Ro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Gansu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Lanzhou, China, 730070)

摘要: 13--14 世纪大量来自中亚、西域的色目人举家东迁中原, 成为以政治、军功起家的文化家族。这些新兴家族无论是上层显赫家族如大都的不忽木家族、贯氏家族、廉氏家族、福建王翰家族、偃氏家族等还是下层军人、农民家族如濮阳崇喜家族, 都经历了由军事政事向文事转变, 进而演变为文化家族的过程。

关键词: 元代; 东迁色目家族; 理学; 文学;

Abstract: In the 13th and 14th centuries, a large number of Semu people from Central Asia and the Western Regions moved their families eastward to the Central Plains, becoming cultural families that started with political and military exploits. These emerging families, whether they are prominent upper-class families such as the Buhumu family, Guan family, Lian family, Fujian Wanghan family, Hao family, etc., or lower-class military and peasant families such as the Chongxi family in Puyang, have all experienced military changes. The process of changing political affairs into civil affairs and then evolving into cultural families.

Keywords: Yuan Dynasty; Semu family who moved eastward; Neo-Confucianism; literature;

回望蒙元时代, 当我们立足中亚, 不仅能看到滔滔黄河与江淮烟雨, 还能看到额尔齐斯河与贝加尔湖; 不仅能看到华北平原与江南丘陵, 还能看到帕米尔高原与钦察草原; 不仅能看到奎章阁与玉山雅集, 还能看到《福乐智慧》与《突厥语大辞典》; 不仅能听到黄钟大吕与咿呀南曲, 还能听到嘹亮的畏兀儿牧歌和阿拉伯商队的驼铃。蒙元帝国神奇的魅力恰在于此。元代色目家族从西

域来到中原，背负西域文学传统开始了汉语言文学的创作，色目家族的文学活动从学写第一个汉字，学说第一句汉话开始，他们的汉文诗歌创作以弱而入，以盛而终，色目作家从无到有，由星星之火渐成为燎原之势，成为元代诗坛的劲旅，推动了元代诗歌的发展。

一、色目家族的理学文化

蒙元前期来自蒙古、中亚、吐蕃、大理、畏兀儿、辽、西夏、金、宋等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宗教的文化交织碰撞，蒙古、色目、汉人的精英学者汇集一处，成千帆竞发之势，构成了一道独具魅力的历史景观。来自中亚、西域等地的色目家族是这种多元文化的重要推动因素。色目文化家族是元代的新兴家族，东迁之初，多以政治、军功起家。无论是上层显赫家族如大都的不忽木家族、贯氏家族、廉氏家族、福建王翰家族、偃氏家族等还是下层军人、农民家族如濮阳崇喜家族，都经历了由军事政事向文事转变，进而演变为文化家族的过程。家族第一代以武功与政事起家，如不忽木家族的海蓝伯，廉氏家族的布鲁海牙，贯氏家族的阿里海牙，马祖常家族的月乃合，崇喜家族的唐兀台，王翰的曾祖武德将军。第二代则是家族由武功转向文事的过渡，大部分的第二代尚未在文坛崭露头角，如不忽木、贯只哥、廉希宪、合刺普华、马世昌、闰马，而第三代则是完成了由武功向文事的转变，他们从小生活在汉地，与汉人杂居，拜汉族的饱学之士为师，与汉族文人学士交往，受到汉文化的濡染，开始崛起于文坛，如贯云石、巉巉、廉惇、马润、崇喜之父达海、偃文质等。第四代则承袭了家族尚文的传统，这一代人大多经历了易代之际的战乱，成为元遗民了，如王翰等。

在色目家族文化的发展中，儒学占有重要地位，是家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色目家族汉化的重要标志，偃逊作诗谈到儒学在家庭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儒术吾家事，光阴亦易过”¹。色目家族东迁以后，国子学和各级学校成为色目人学习儒学的重要途径。

色目作家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迺贤、丁鹤年、吉雅谟丁、爱理沙、萨都刺、鲁至道、仇机沙、买闰、别里沙、哲马鲁丁等有伊斯兰文化背景，马祖常、金哈喇、雅琥、赵世延、别都鲁沙等为基督教世家，余阙、王翰、孟昉等有儒学文化背景，偃氏家族是摩尼教世家，²巉巉、安藏、必兰纳识里、迦鲁纳答思、阿鲁浑萨里等是佛教文化背景。在不同种族之间，忠孝仁义的思想是相通的，西域地区素有忠义的传统，色目作家又有耿直彪悍的民族气质，内迁以

¹[元]偃逊：《金陵将归寄舍弟燠二首》，韩国庆州偃氏藏旧钞本《近思斋逸藁》（卷一），现收于杨镰主编：《全元诗》59册，中华书局，2013年，第16页。

²黄时鉴根据《庆州偃氏诸贤实记》考述了偃氏一支东渡高丽的情况，认为高昌偃氏是佛教世家，与陈垣所论摩尼教世家相左。黄时鉴：《元高昌偃氏入东遗事》，陈尚胜主编：《第三届韩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

后，在其科举和国子学等经历中，不断学习儒学，结出色目人忠君报国的理学奇葩，他们延续了南宋理学，为宋明理学的传承与发展做出贡献。

蒙元时期，色目人对理学的接受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弱而盛的过程。延祐开科后，更为色目人学习理学创造条件，色目人学习践履理学成为一种潮流，元代理学对色目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色目作家对理学的践履呈现出一种“西北气质”。

大蒙古国时期，于太宗五年（1233）创建的国子学是各族官员子弟研修汉学最早的机构。忽必烈时代（1260--1294）政治中心移到汉地，内迁的蒙古、色目人约有三四十万，而汉人则有六千万以上，汉人成为主要统治对象，蒙古统治者尝试汉法治国，为了稳固政治统治，不得不倡导汉文化，在中央和地方广设学校讲习儒学。至元七年（1270）在中央重建国子学，由理学大师许衡主持，各地斡鲁朵、投下及色目人为主的卫军中开设学校，讲授儒学内容。这一时期，汉学大儒姚枢、许衡、李德辉、刘因等肩负文化救亡的历史使命，努力接续行将断裂的汉学一脉，他们先后为太子真金和其他皇子授业，起到了很强的宣示作用。皇庆二年（1314）元朝恢复科举，为了求得更好地生存与发展的空间，以儒学为考试内容的科举成为蒙古、色目人研习理学的主要动力。大批蒙古、色目人亲历场屋之困，在前后十六科的元代科举考试中录取的进士有 1139 人，其中蒙古、色目人有 400 人，占三分之一，而乡贡进士即乡试及第而会试落榜的人约两千人，参加乡试的蒙古色目子弟人数十倍于此，³即约二万人。那些汉化较早，重视文化传统的家庭在科举中占得先机，如高昌楔氏两代人中，出了九位进士，一位乡贡进士，成为著名的科举世家。再如地位显赫的汪古马氏家族、高昌廉氏家族都有多人及第。河南濮阳西夏遗民唐兀崇喜家族是色目下层军人家族的代表，第一代唐兀台（1197--1257）从军东迁，第二代阎马(1248--1328)参加了襄阳会战，以下层军人的身份定居河南濮阳，第三代崇喜之父达海即唐兀忠显（1280---1344），第四代崇喜，第五代理安，这个家族从第二代开始就重视汉学教育，几代人坚持不懈创建崇义书院，虽然家族五代没有进士及第，也没有出现著名儒士，但其第四代崇喜、卜兰台兄弟二人就读国子学，第五代崇喜之子理安（娶了伯颜宗道之女）也是国子生，受到了高规格的儒学教育。崇喜家族祖先是普通士兵，家族五代人中最高的职位不过百户，典型地反映了下层军人家庭的士人化，色目军人家族从军功向文事的转变，以及士人阶层在色目族群中的扩张。元廷中汉法派与反汉法派之争从未间断，在反汉法派蔑儿乞氏伯颜当政的后至元时期（1335--1340），科举被废。至元六年（1340）脱脱当政后，汉儒再度得到重视，至正二年（1342），恢复科举。科举之士对君臣伦常观念的体认，远比那些没有受过理学思想熏陶的封

³萧启庆：《九州四海风雅同一

元代多族士人圈的形成与发展》，中央研究院联经出版公司，2012年，第25页。

疆大吏要强烈，如杨维桢所论：“我朝科举得士之盛，实出培养之久，要非汉比也。至正初，盗作。元臣大将守封疆者不以死殉而以死节闻者，大率科举之士也。兵革稍息，朝廷下诏取士如初。”⁴清代赵翼也总结道：“然末年仗义死节者，多在进士出身之人。”⁵元代理学忠君思想对色目人深刻的影响可见一斑。

深受理学思想浸润的色目文人，无论在日常生活中、朝堂之上还是在生死抉择的战场上，都以赤诚的情怀躬身践行理学甚至以生命践履理学，在元末战争中，涌现出大量死节之士。在《元史·忠义传》的大量以死殉国的案例中有很多色目人，他们都有国子学和科举的经历，举其要者，有唐兀进士丑闾、明安达尔、塔不台、余阙、迈里古思等；畏兀儿进士昔里哈刺、普达实立、家铉翁、偃玉立、偃直坚、偃哲笃、偃朝吾、偃列箴、偃百僚、廉惠山海牙、三宝柱、拜都；回回进士吉雅谟丁。

许衡在国子学任教期间，也谈到蒙古与色目生员质朴的特点，认为质朴的弟子经过理学熏陶后可堪大用。余阙、泰不华、唐兀崇喜、伯颜宗道、贯云石、王翰、廉希宪、不忽木、巉巉、回回、薛昂夫、马祖常、赵世延等大批色目作家对程朱理学的深刻解读，为许衡之说给予了最好的诠释。至正十二年（1352），余阙率四千羸弱之兵与陈友谅军鏖战，苦守孤城庐州三个月，破城之日，余阙引刀自刎坠于清水塘中，妻子儿女亦投井而亡。⁶同年，儒者泰不华在台州与方国珍部战于船上，其力大过人，肉搏战中手刃数人，最终被敌众包围，死于敌人的长矛之下。⁷朝堂上守正不阿，沙场上拼死报国，他们之耿介性情、刚烈行为，不失西北民族强悍之遗风。易代之际，更见节操，色目作家的气节令清代学人感佩，四库馆臣盛赞丁鹤年等人的人格高尚，认为元末作家沈梦麟出任明朝贡举的事，和杨维桢、胡行简是一类，比起丁鹤年这类节义

4[元]杨维桢：《送王好问会试春官叙》，《铁崖先生集》卷2。四部丛刊初编本。

5[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30，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706页。

6《元史·余阙传》载其浴血奋战，自刎报国的事迹，“西门势尤急，阙身当之，徒步提戈为士卒先。……自以孤军血战，斩首无算，而阙亦被十余创。日中城陷，城中火起，阙知不可为，引刀自刎，堕清水塘中。阙妻耶卜氏及子德生、女福童皆赴井死。”并称其笃志于儒学“阙留意经术，《五经》皆有传注。为文有气魄，能达其所欲言。”《元史》卷143《余阙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428页。

7泰不华治学倾向于邵雍之学，曾向苏天爵求邵雍的《皇极经世说》一书。见于苏天爵《答達兼善郎中書》：“閣下由进士得官二十余年，始以文字为职业，人则曰儒者也。及官风纪，屡行而屡止，孰知其志之所存乎。向谕印祝泌皇极经世说，谨装潢纳上……每见公读邵子书不去手，晚岁又释外篇，”《滋溪文稿》卷二十四。[元]苏天爵著；陈高华，孟繁清点校：《滋溪文稿》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415~416页。《元史·泰不华传》记载其死前英勇杀敌的情景：“即前搏贼船，射死五人，贼跃入船，复斫死二人，贼举槩来刺，辄斫折之。贼群至，欲抱持过国珍船，泰不华瞋目叱之，脱起，夺贼刀，又杀二人。贼攒槩刺之，中颈死，犹植立不仆，投其尸海中。年四十九。”《元史》卷143《泰不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425页。

刘基作赋《吊泰不华元帅赋》称泰不华一生忠诚耿介：“世有作忠以致怨兮，曾不知其故然。怀先生之耿介兮，遭时命之可怜。……权不能以自制兮，谋不能以独成进，欲陈而无阶兮，退欲复而无略。”《诚意伯刘文成公集》卷九，四部丛刊本。

之士要低一格，“梦麟以前朝遗老，不能销声灭迹，自遁於云山烟水之间，乃出预新朝贡举之事。此与杨维桢等之修《元史》、胡行简等之修《礼书》，其踪迹相类。以较丁鹤年诸人，当降一格。”⁸无论是崇喜在生活中恪守理学规范的虔诚之心，贯云石普及孝经的热情，还是伯颜宗道、余阙、王翰、泰不华等以生命来践履理学的死节之行，同为“西北子弟”接受并践行程朱理学之最佳脚注。

民族文化交流是双向的，中原理学影响了周边民族，而不同民族的参与反过来也丰富了理学自身，携带“西北气质”践履理学的“西北子弟”为元代理学增添了新的色彩恰可为证。后天学习濡染固然重要，但先天气质亦不容忽视，从遗传学的角度讲，个性气质难以在几代人的时间里彻底改变。被儒学思想中浸润千载的中原汉人，思想行为已成定势，规矩细腻中缺少一种与恶势力血战到底的决心，而以气质简约粗犷为特点的色目人学习理学则与之不同，儒化的色目人更有一种决绝与忠贞的品性，别具一格。我们不妨称之为“西北气质”。色目作家群是北方游牧文化和中原汉文化融合的结合，他们的加入使元代理学遂灿然有烂，推动了理学实践化的进程，“西北子弟”践履理学所携带的这种“西北气质”成为元代理学实践中最亮丽的一道风景，使得元代理学在宋明理学发展史上别具风采。

二、色目文化家族的文学创作

元代文化是以多元混融和深刻包容性为特征的世界性文化，这是色目作家大量涌现的文化环境。在元代各民族文化交融的背景下，汉文化是强势的，但有向少数民族政权及其文化妥协的一面。色目人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从现实政治考虑，汉族文人要依附蒙古、色目等地位高的人群，从文学艺术的接受的层面，作家要考虑受众的接受能力，形象化的杂剧更容易接受，通俗的文艺形式更容易接受，戏剧、小说等文艺形式开始崛起。然而，千百年来诗歌为正统，言志的工具是诗，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其他艺术形式都是末流。元代色目作家依然秉持儒家的诗教观，以诗歌为最上，视诗歌为正统、主流，色目作家的文较少，杂剧较少，通俗文学为末流。东迁汉地以后，他们血脉中的传统因素和汉地文化不可避免的起着矛盾冲突，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渐进式的文化融合既深刻又不可能一蹴而就。色目人的各自背负的文化传统并没有象我们想象的那样全线崩溃消亡，在逐渐融入汉文化圈的同时，他们保留了一些的传统文化，保留了色目人的身份。色目人的彻底融入汉文化圈是在明代。迁居内地后，色目人并没有立刻放弃自己民族文化，他们有些家族在东迁汉地后的前三代还在使用本民族语言，保留各自的民族文化，并可以进行双语创作。

（一）以家族为单位的东迁色目人家族文化

⁸ “沈梦麟《花溪集》提要”，纪昀：《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97，第2257页。

大都不忽木家族、贯氏家族和廉氏家族、光州马祖常家族、濮阳崇喜家族、福建王翰家族等自北而南流寓中原各地的色目家族汉语言文学创作的实践，折射出元代色目人汉语创作从无到有的过程以及色目人文学发展的特点。

色目文化家族无论是上层显赫家族如大都不忽木家族、贯氏家族、廉氏家族、福建王翰家族、偃氏家族等还是下层军人、农民家族如濮阳崇喜家族，都经历了由军事政事向文事转变，进而演变为文化家族的过程。

东迁后的色目家族，第一代以武功与政事起家，如不忽木家族的海蓝伯，廉氏家族的布鲁海牙，贯氏家族的阿里海牙，马祖常家族的月乃合，崇喜家族的唐兀台，王翰家族的曾祖武德将军。第二代则是家族由武功转向文事的过渡，大部分的第二代尚未在文坛崭露头角，如不忽木、贯只哥、廉希宪、合刺普华、马世昌、闰马，而第三代则是完成了由武功向文事的转变，他们从小生活在汉地，与汉人杂居，拜汉族的饱学之士为师，与汉族文人学士交往，受到汉文化的濡染，开始崛起于文坛，如贯云石、巛巛、廉惇、马润、崇喜之父达海、偃文质等。第四代则承袭了家族尚文的传统，这一代人大多经历了易代之际的战乱，成为元遗民了，如王翰等。而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他们维护自己的民族身份，尤其是色目人与色目人通婚的家族，更是保持了强烈的民族意识，这在文学作品中有一定程度的体现。

有元一代，色目家族经历了五、六代人的繁衍发展，家族成员的汉语言文学创作经历了从生疏到熟练自如的发展过程。几乎每一个色目家族都要经过漫长的家庭文化的积累与代际传递，才能培养出一个出色的汉语言作家，很难在一代人之内完成。而那些下层军人、农民家族，则需要用更长时间，付出更多努力才能达到目的。在著名的色目作家中，不忽木、贯云石、廉惇是家族第三代，马祖常、唐兀崇喜、王翰、偃玉立、巛巛和回回是家族第四代。

色目家族的文学活动与家族汉化密切相关。一些研究者认为色目家族在两、三代后就彻底汉化了，事实并非如此。汉化过程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受到家庭、社会、政治、宗教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色目家族自身的西域文化传统和汉地文化不可避免的起着矛盾冲突，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渐进式的文化融合既深刻又不可能一蹴而就，色目家族的各自背负的文化传统不可能快速全线消亡。以不忽木家族为例，不忽木、巛巛等人迁居汉地已是第三代和第四代（巛巛卒于1345年，已经接近元代后期了），巛巛还在使用畏兀儿语进行创作，其汉语诗歌创作水平依然简单粗疏并且有明显模拟痕迹。

色目家族东迁汉地以后，从现实利益考虑，保留民族身份和民族文化更有利于提高家族社会地位，获取更多社会资源。元代色目作家的母语创作绵绵不绝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历史上双语作家现象并不鲜见，但在元代特别突出。受到元代政治、宗教、民族、文化、语言等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双语创作蔚然成风，以不忽木家族的巛巛为代表一大批双语作家构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群体，成为元代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二) 优良的家族文化为色目家族的文学活动奠定基础

色目文化家族重视家庭教育，嗜学的优良家风为家族成员的文学活动提供条件。廉园藏书两万多卷，廉园的文人雅集连续几十年，为家族子弟饱读诗书营造了良好的家庭氛围，贯云石及其舅舅廉惇等家族子弟就是在当时文坛一流作家的雅集唱和中走上文学艺术创作之路，成长为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唐兀崇喜家族三代人坚持不懈创办崇义书院，乐学向善的家庭文化代代传承，使得这个下层军人家族逐渐演变为一个诗书传家的书香门第，这种家庭文化为家族在濮阳地方社会赢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并在濮阳地方文坛占有一席之地。在众多色目家族中，无论是位于北方的不忽木家族、贯氏家族、廉氏家族，位于中原的崇喜家族、马氏家族，还是位于南方的王翰家族，儒学无一例外成为家族文化的主导，儒学成为文学创作的起点、科考进身的工具、维系家族兴旺繁衍的纽带。

家族迁居地文化深刻影响了色目家族成员的文学创作，燕赵文化之于不忽木家族，江淮文化之于马祖常，闽南文化之于王翰家族，都有深刻的影响。这使得色目作家的文学创作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家族居地不同的色目作家因为受到不同地域文化的影响，对同一题材的表现，呈现出不同的表现视角和风格。影响创作风格的因素有很多，仅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来看，江南的温婉之气消解了西北粗豪之气，使得家族居地在江南的色目作家的诗风呈现出一种儒者的温柔敦厚之态，趋向于细腻精致，比如色目作家王翰、迺贤就具有清秀精巧的江南风格的。而家族居地在北方的作家则更多地体现了粗豪之气，如萨都刺、不忽木、巉巉、崇喜等则是北派风格的代表。还有一些游历南北的作家，受到多种地域文化的影响，其创作风格会随之而发生改变，如贯云石、马祖常等具有熔铸南北的风格。同时兼容西域文化因子的色目家族成员的文学活动也反哺当地文化，丰富了地域文化的内容，唐兀崇喜与父亲达海所制定的乡约，就美化了濮阳地区当地民风。贯云石曾改造海盐腔，诗词曲作品在江浙地区受到欢迎，为浙江文化作出贡献。

大多数从事文学创作的色目作家都成长、成名于大都、杭州、福州等政治、文化中心，随着家族成员的宦游足迹遍及全国各地，不忽木家族、贯氏、廉氏、马氏等家族文学的影响也是全国性的。而濮阳崇喜家族的影响力则是限于地方。福建王翰家族在元代的影响是区域性的，而到明代随着“闽中十子”王偁的成名，其影响则是全国性的。贯云石诗歌无论是效仿李贺的奇崛险怪之气，还是后期强调自我安逸性情的冲淡简远之风，都深刻影响了杨维桢和元末东南文坛的走势。元代诗歌在延祐时期达到高潮，而马祖常是当时主持雅正雍容风气的巨擘，并对元末文坛产生影响。逮及元末易代之际，以王翰、唐兀崇喜、伯颜宗道等为代表的色目作家以对故国的深情和沉郁顿挫的笔触为元代诗坛画上了句号。

(三) 色目作家的创作丰富了元代文坛

受到元代政治、宗教、民族、文化、语言等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巉巉、安藏、必兰纳识里、迦鲁纳答思等一大批双语作家应运而生，成为元代这一特定历

史阶段的产物。历史上双语作家现象并不鲜见，但在元代特别突出，双语作家的产生与元代佛教播迁密切相关。元代双语作家不但存在而且蔚然成风，构成一个颇具规模的群体。

《述善集》反映了在元末文坛主将张翥、危素的影响下的濮阳地方作家的创作情况，与元末主流文坛息息相关，崇喜等濮阳色目作家受到理学思想的强烈影响，其文学作品表现出政教、实用、关注现实等儒家文艺观。《述善集》在元代文学和中国理学史上都应有一席之地。

元代色目作家的发展从时间上讲，后期诗人多于前期诗人；从空间上讲，南方诗人多于北方诗人。综合色目作家的碑铭、墓志、家谱等史料，可知色目作家在内迁后的第二代还极为罕见，从第三代开始出现，多数色目作家出现在第三、四代。从题材上看，南方作家和旅居南方的北方作家都选取了最具江南特色的自然景观，同样北方地域题材也在南、北方作家的诗歌中得到广泛反映。不同地域文化之下成长起来的色目作家，对同一题材的表现，呈现出不同的表现视角和风格。在大部分南方色目作家的作品中，南方纤弱之气消解了西北粗豪之气，使得一些色目作家的创作呈现出一种儒者的温柔敦厚之态，但也并没有达到南方传统意义上的细腻精致柔媚的风格。在色目作家乃至整个元代诗歌中，迺贤、金哈喇诗歌是最具有细腻精巧的江南风格的，而萨都刺、不忽木、巉巉等则是北派风格的代表，马祖常、王翰等具有熔铸南北的风格。

无论北方的廉园雅集、圣安寺宴游、《述善集》赠答，还是江南的玉山雅集，都有色目作家的身影，在元末文坛的两大发展趋势中，无论现实派还是审美派，色目作家都积极参与。色目作家对元代文坛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贯云石诗歌无论是效仿李贺的奇崛险怪之气，还是后期强调自我安逸性情的冲淡简远之风，都深刻影响了杨维桢和元末东南文坛的走势。元代诗歌在延祐时期达到高潮，而马祖常是当时主持雅正雍容风气的巨擘，并对元末文坛产生影响。色目作家从无到有，以弱而入，自模仿始，终蔚然繁盛。色目作家的作品更体现出元诗浅易直白的特点。明代人出于政治民族等原因，贬低元代文学，“明人夸诞，动云‘元无文’者，其殆未之详检乎。”⁹事实上，西域各民族文学的水平在元代达到历史巅峰，而元代色目作家的创作成就显示，各少数民族作家的汉文创作也达到了历史巅峰。尽管如此，诗歌承载着人类最深刻的思维、最幽微的情感，需要最深厚的学养来砥砺琢磨，需要最真诚专注的赤子之心来滋养，需要最优渥的社会时代来培植，唯此始见奇才精品。显然，这样的条件没有出现在元代。百年元代诗歌，无论是色目作家还是汉族文人的创作，都像是蹒跚学步的小儿，他没有足够的时间长成一个健壮的青年，戛然而止于蹒跚起步阶段，因此，无法与发展千年的、富于独特个性的唐宋诗歌相抗衡。

三、色目人创作发展的分期

⁹ “虞集《道园学古录》提要”，纪昀：《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97，第2228页。

元代文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一、萌芽与酝酿期—从大蒙古国到元武宗至大年间(1308-1311)，二、高潮期—元仁宗延祐（1314-1320）到元惠宗至元时期（1335--1340），三、发展期—元惠宗至正时期（1341-1368）。色目作家产生、发展过程与元代文学的发展相始终，按照色目作家的主要创作时期，结合元代文学发展的进程，以元仁宗延祐（1314-1320）为界，笔者把元代色目作家群进行了分期，按时间可分为前后两期。

前期作家主要有：贯云石、廉惇、必兰纳识里、安藏、高克恭、观音奴（鲁山）、不忽木、赵世延、丁文苑、盛熙明等。后期作家主要有：马祖常、萨都刺、伯颜不花、边鲁、马（薛）昂夫、道童、王嘉闰、楔玉立、楔逊、丁鹤年、张雄飞、余阙、买住、王翰、唐兀崇喜、昂吉、观音奴（志能）、嚶嚶、回回、伯颜宗道、乃贤、金哈刺、泰不华、凯烈拔实、答禄与权、萨都拉、伯颜子中等。还有一些作家，生卒年不详，作品也很少或是没有作品留存，我们就无法进行分期。纵观元代色目作家群，多数色目作家身兼官员与作家双重身份，后期诗人多于前期诗人，南方诗人多于北方诗人。

总的来说，色目作家的创作水平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前期色目作家，如安藏、必兰纳识里、不忽木等熟知本民族语言和汉语，能进行双语创作，从早期作家到后期作家，我们能看到写作技巧日益娴熟。以题为《岳阳楼》的诗歌为例。早期作家高克恭、贯云石、张翔有浓重的模仿痕迹，文笔稍显艰涩，意象不够鲜活，而后后期作家迺贤抒情写景都从容自如，遣词造句信手拈来，意象生动鲜活、手法之娴熟，超越了前期作家。

九水汇荆楚，一楼名古今。地连衡岳胜，山压洞庭深。宿雁落前浦，晓猿啼远林。倚阑搔白首，空抱致君心。（高克恭《岳阳楼》）

天远岳阳楼影孤，下窥梦泽渺平芜。城南老树依然在，试问仙童重到无。（贯云石《题岳阳楼》）

西风吹我登斯楼，剑光影动乾坤浮。青山对客有余瘦，游子思君无限愁。昨夜渔歌动湖末，一分天地十分秋。（贯云石《岳阳楼》）

楼上元龙气不除，湖中范蠡意何如。西风万里一黄鹄，秋水半江双白鱼。鼓瑟至今悲二女，沈沙何处吊三闾。朗吟仙子无人识，骑鹤吹箫上虚。（张翔《岳阳楼》）

岳阳楼下船初泊，恢岸黄芦秋漠漠。刳羊浇酒赛龙君，高褂蒲飘晚风作。白头波里君山青，满湖明月进洞庭。金银台殿出林麓，踈钟隐隐烟中听。小市人家茅缉缉，山翠蒙蒙客衣湿。一声渔唱浦口回，竹艇摇摇归

去急。崖顛云气暝不开，夜深风雨如奔雷。游子衣寒倚篷看，一双白雁沙头来。只今作客僧窗下，白发镜前空看画。谩吟诗句忆潇湘，少慰江南未归者。（迺贤《题潇湘八景图》）

宋元易代之际，文学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元初文学的主要任务就是矫正宋末文学陋习，重振文坛新风气，变革是元初文学发展的主题。宋末江西诗派、江湖派、四灵派盛行，诗风尖巧纤佻，道学派文风庸沓猥琐，元代诗文脱胎于此。“诗文皆沿宋季单弱之习，绝少警策”¹⁰；“免诗文皆光明俊伟，有中原文献之遗，非南宋江湖诸人气含蔬笋者可及”¹¹等。

针对这种情况，元代文人表现出振衰起废的勇气，以大气象来矫正孱弱诗风是元代文人的使命。宋初西昆体变而为元佑体，又变为江西诗派，又变为江湖四灵等诗派，至元杨载、虞集等能改掉宋末之弊，开始从卑弱纤巧，走向大气雅正：

盖宋代诗派凡数变。西昆伤於雕琢，一变而为元祐之朴雅；元祐伤於平易，一变而为江西之生新；南渡以後，江西宗派盛极而衰，江湖诸人欲变之，而力不胜。於是仄径旁行，相率而为琐屑寒陋，宋诗於是扫地矣。载生於诗道弊坏之後，穷极而变，乃复其始。风规雅贍，雍雍有元祐之遗音。史之所称，固非溢美。故清思不及范梈，秀韵不及揭傒斯，权奇飞动尤不及虞集，而四家并称，终无忤色，盖以此也。”（杨载《杨仲弘集》提要）¹²

然南宋季年文章凋敝，道学一派以冗沓为详明，江湖一派以纤佻为雅隽。先民旧法几於荡析无遗。士林承极坏之後，毅然欲追步於唐人，虽明而未融，要亦有振衰起废之功，所宜过而存之者也。（任士林《松乡文集》提要）¹³

文章至南宋之末，道学一派侈谈心性；江湖一派矫语山林，庸沓猥琐，古法荡然。理极数穷，无往不复。有元一代，作者云兴。大德、延祐以还，尤为极盛。而词坛宿老，要必以集为大宗。此录所收，虽不足尽集

¹⁰ “王义山《稼村类稿》提要”，纪昀：《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97，第2603页。

¹¹ “评论杨奂《还山遗稿》”，纪昀：《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97，第2613页。

¹² 纪昀：《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97，第2228页。

¹³ 纪昀：《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97，第2210页。

之著作，然菁华荟萃，已见大凡。迹其陶铸群材，不减庐陵之在北宋。

(虞集《道园学古录》提要)¹⁴

世祖时期，元代诗文创作相对低迷，大德、延祐以后，杨载(1271—1323)、虞集(1272--1348)、范梈(1272--1330)的崛起为标志，元代文学开始勃兴。色目人的汉语诗歌创作于此同步，在至元(1263--1294)、大德(1297--1307)年间，以不忽木(1255--1300)、高克恭(1248--1310)为代表的色目作家数量少、作品质朴少文，模仿痕迹很重，处于起步阶段。从武宗至大时期(1308--1311)开始，到延祐时期(1314--1320)，以贯云石(1286--1324)、廉惇(1276--?)为代表色目作家开始成熟起来。有元一代诗风宗尚李贺、温庭筠，“惟七言古诗时杂李贺、温庭筠之体。盖有元一代风气如斯。”¹⁵贯云石的诗风奇崛，是早期效法李贺的代表，在早期的元代诗人中独树一帜，为元末杨维桢所仰慕。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到延祐(1314--1320)、至治(1321--1323)年间，元代文学出现了一批有才华作家，“范、杨、虞、揭”四家、马祖常、黄溍、袁桷、邓文原、陈旅、陈孚、贡奎、许有壬等以其雍容典雅的文风，影响了元代文坛，一时间，雅正之风占据文坛。这一时期文风雅正醇美却又朴厚，无雕琢靡丽之态。四库馆臣对这一时期的文风及诗人蒲道源的诗风作了准确的概括：

国家统一海宇，士俗醇美，一时鸿生硕儒所为文，皆雄深浑厚，而无靡丽之习。承平滋久，风流未坠。皇庆、延祐间，公以性理之学施於台阁之文。譬如良金美玉，不假锻炼雕琢，而光耀自不可掩。¹⁶

马祖常以“西北子弟”的身份称霸延祐文坛，格外令人瞩目。苏天爵称马祖常在元代文坛具有崇高的地位：

接武隋、唐，上追汉、魏，後生争效慕之，文章为之一变。与会稽袁桷、蜀郡虞集、东平王构更迭倡和，如金石相宣，而文益奇。盖大德、延祐以後，为元文之极盛，而主持风气，则祖常等数人为之巨擘云。¹⁷

逮及元末易代之际，色目作家或以死报国，或于战乱之中雅集继续审美的追求，他们以生命书写诗篇，成为元末诗坛的劲旅。元末明初，即便是汉族文人，如杨维桢、叶子奇、郑玉、宋濂、刘基等也怀念元廷、不情愿为明朝效力，蒙古、色目人更是视蒙元为本朝，强烈维护元廷。以余阙、泰不华、王翰、金哈喇、脱脱木儿、唐兀崇喜、伯颜宗道等为代表的色目作家经历着共同的困境，在

¹⁴ 纪昀：《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97，第2228页。

¹⁵ “岑安卿《栲栳山人集》”，纪昀：《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97，第2242页。

¹⁶ “蒲道源《闲居丛稿》提要”，纪昀：《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97，第2232~2233页。

¹⁷ “马祖常《石田集》提要”，纪昀：《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97，第2227页。

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冲突中，甚者以身家殉国，表现出忠君爱国的不屈节操。体现在诗歌中，他们忧心时局发展、关注战争民生，战火硝烟充斥在诗歌中，同时创作更加成熟，情感更为沉郁，文风也由延祐的雅正雍容转而平易通俗而贴近现实，加强了叙事性。色目作家以对故国的深情、沉郁顿挫的笔触为元代诗坛画上了句号。